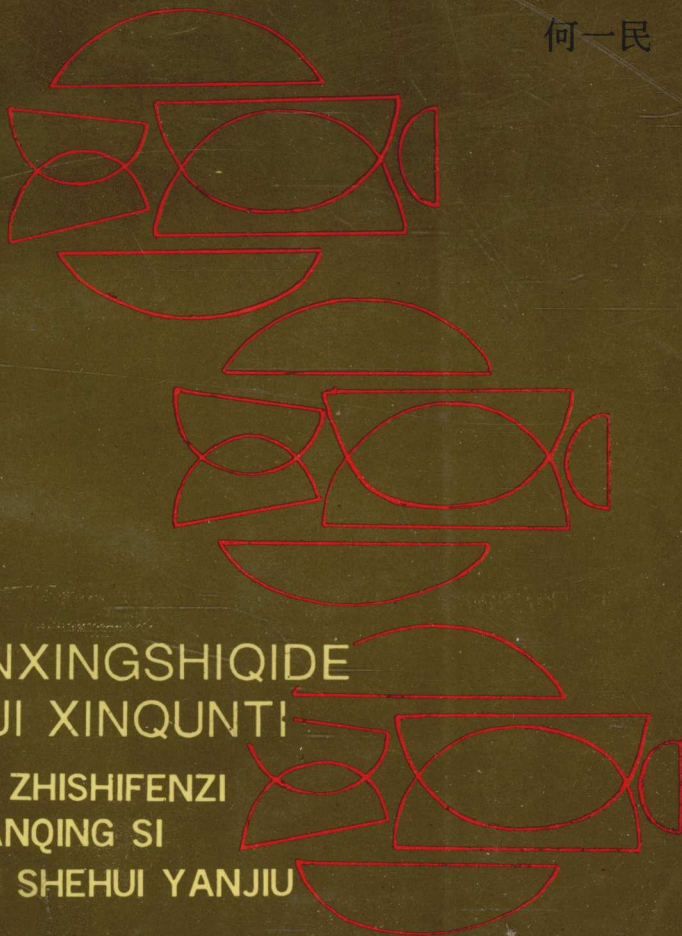


转型时期的社会新群体

近代知识分子与晚清四川社会研究

何一民 著



JANXINGSHIQIDE
SHEHUI XINQUNTI

JINDAI ZHISHIFENZI
YU WANQING SI

SI CHUAN SHEHUI YANJIU

250.3

四川大学出版社

转型时期的社会新群体

近代知识分子与晚清四川社会研究

何一民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年·成都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陈丽莉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石大明

转型时期的社会新群体

——近代知识分子与晚清四川社会研究

何一民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 印张 1 插页 字数 155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ISBN 7-5614-0728-9/C·38

定价:3.00 元

引言

在昔虜清，恣淫肆虐，天厌其德，豪杰奋发，共谋倾杞，以清禹域。惟蜀有材，奇瑰磊落，自邹迄彭，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允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导江千岳，俊哲挺生，厥为世率……

——孙中山——

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舞台上，近代知识分子^{〔1〕}是一个新崛起的社会阶层，是一支非常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既导演又表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雄壮活剧，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知识和理想，书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一页又一页的光辉篇章。他们的产生和发展，成长和变迁，命运和前途，不仅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对此，近年来史学界已开始重视。不过，从现在已有的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些论著看，多是以长江中下游的两湖、江

浙以及东南的闽、粤等地区的知识分子为研究的中心，而对内地知识分子缺乏深入的剖析研究。等者认为，既要总体上研究近代知识分子，也有必要对它的各个部分进行分析，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所以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发展的状况也是不平衡的。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晚于江浙等沿江、沿海地区，大约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20世纪初年，四川近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群，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2. 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3. 新式学校的普遍设立和留学生运动的兴起。

近代知识分子和封建知识分子有着血缘关系，从四川近代知识分子考察，其来源主要有三种：1. 一批有着进士、举人功名的封建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2. 一批有着廪、贡、监生等小功名的知识青年，在科举制度废除后，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成为近代知识分子。3. 一批无科第、无官阶、出身工商业家庭或贫寒之家的知识青年，经过新式学校或留学教育的培养，成为近代知识分子。

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输入、新式教育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近代知识分子内部结构也较封建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步奠定了现代知识分子结构的格局。由劳动性质的差别决定的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结构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教育界知识分子所占比例特大，是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的主要部分。第二，科技知识分子数量少，质量也比沿江、沿海地区的科技知识分子差。

四川近代知识分子内部结构的这种不平衡性，反映了四川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缓慢的状况。

近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较封建知识分子也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是以封建的旧学为主，前者则是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等知识为主。知识结构的变化，使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发生变化。

辛亥革命前，四川近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政治觉醒的过程，即从爱国救亡——维新变法——反清革命——民主共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而要爱国救亡，就要变法维新。当变法维新不能救亡时，他们又产生了新的觉醒：要爱国救亡就要反清革命，就要推翻腐朽反动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觉醒和新觉醒，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进步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

近代知识分子和封建知识分子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色：

1. 两者的阶级属性不同。封建知识分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而近代知识分子则是依附于民族资产阶级。因而前者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进行剥削和统治。后者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的前途和命运都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也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
2. 两者的知识结构不同，近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出现了新的层次，同时，一部分人还与社会生产发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3. 近代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把爱国主义纳入到近代民族运动的范畴中，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
4. 他们有着高度的斗争热情和

牺牲精神。

四川近代知识分子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着一些特色：1. 近代化起步晚，但发展迅速。2. 反帝思想突出。3. 爱国主义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紧密结合。

由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学习西方、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和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近代知识分子被推上了历史前台，居于时代中心的地位，扮演了各种英雄的角色，发动和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立宪运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觉醒，为彻底埋葬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民主运动等几方面，具体地分析和评价了四川近代知识分子所起的历史作用，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1
一、传统士人的蜕变	1
二、新群体的形成	10
第二章 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结构	22
一、来源构成	22
二、内部结构	28
三、知识结构	37
第三章 跨世纪的选择	50
一、救亡维新的双重变奏	50
二、新世纪的选择	61
第四章 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75
一、新旧知识分子的区别	75
二、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特色	82
第五章 近代知识分子与晚清四川社会的变革	94
一、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94
二、近代知识分子与晚清四川思想启蒙	96
三、近代知识分子与四川资本主义的发展	110
四、四川近代知识分子与维新变法运动	116
五、四川近代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	121
结束语	159
注 释	165
后 记	185

第一章 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一、传统士人的蜕变

辛亥革命前的四川新知识界是由近代知识分子所组成。所谓近代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在本质上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主要有新式学校的教师、学生、留学生、技师、学者、医生、记者、编辑以及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有关的知识分子。他们或经国内新式学校、国外留学的教育，或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其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尺度、道德准测、政治理想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所谓的近代知识分子群，则是指由近代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社会集合体，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形成是伴随着封建主义的解体，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这两个过程而进行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封建的知识分子，即所谓传统的士大夫；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近代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社会大动荡、阶级大分化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新型知识分子。近

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因此近代知识分子的产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果就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时间看，大体上是和各地区近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可分为三个层次。近代知识分子首先产生于东南沿江、沿海地区和京师等近代化进程较早的地区，其次是内地的部分省份，再次是西北、东北等沿边的省区。四川虽僻处西南，但由于它处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第二层次地区，所以四川的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时间虽晚于东南地区和京师，但却早于沿边的第三层次地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形成的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甲午战争前。是四川旧知识界开始分化，出现了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趋势的时期。

四川在鸦片战争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保持着封闭状态，自然经济基本保持了它的完整性，文化思想也无多大变化。

明末清初，四川屡遭兵燹摧残，文化教育衰败。到康雍乾时，清统治者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来对付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科举八股，笼络人心，禁锢思想。因此，清初以降，蜀学衰微，一蹶不振，士林风气败坏，腐化堕落，书院生徒只知八股制艺，抱残守阙，一心梦想通过科举踏上黄金之路。^{〔1〕}而封建的士大夫们愚昧颡顽，或热衷诉讼，^{〔2〕}或请仙扶箕，或把理学、释老、方技揉合在一起著书授徒。^{〔3〕}鸦片战争对四川知识界没有产生什么震动，他们依然睡眼朦胧，置国家和民族的安危而不顾。麻木、偏狭、闭塞、无知成为鸦片战争后四川旧知识界的症状。

四川旧知识界开始发生变化，闭塞、沉闷状况被打开一个缺口，是以四川尊经书院的建立为起点的。

四川尊经书院是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商于四川总督吴棠在成都创办的。^[4]创办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不正学风，振兴蜀学，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材”，^[5]把士子们纳入到儒家正统的轨道上来。学生所学为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其后又增加少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张之洞认为“非博不通，非专不精”。一切学术不可偏废。^[6]但八股文则排斥在外，不作为在院学生的学习科目。尊经书院仍是旧式书院，其教育改革也是在封建传统教育范围进行的。但它的建立对四川知识界风气的整肃，蜀学的振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风向所趋，人人皆知读书之有益矣”。^[7]特别是“王闿运为山长，蜀学大变，人文蔚起。”^[8]为四川早期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四川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著名人物，如宋育仁、廖平、吴之英、骆成骧、徐炯、顾印愚、吴玉章、黄芝、蒲殿俊等人都曾在此学习。此外还有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与尊经书院发生联系，可以说尊经书院是四川早期近代知识分子的摇篮。尊经书院不仅在人员上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而且在思想上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光绪四年底，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王闿运应聘为尊经书院山长，他以所著公羊笺传入四川，主张阐微言大义之旨，教崇本达用之方。“王闿运力挽颓风，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操感士子，且经议论贬当世也，所以四川学术界的空气一变而挚厚清高。”^[9]同时，经世致用思潮也经王闿运提倡开始在四川传播。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即在中国思想界兴起，龚自珍、魏源等人忧于国事日非，受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激荡，将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注意研究现实社会问题，揭露封建社会黑暗、腐朽，抨击汉学与

宋学，主张抵制外国侵略，并倡言变法，改革中国。经世致用思潮在四川传播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廖平、宋育仁等人将老师王闿运的思想加以“发皇光大”，推衍出托古改制的观点（参见本书第五章“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在此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开始关心时事、政治，留心西学、新学。中法战争后，宋育仁受民族危机刺激，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怀疑，逐渐形成自己的改革主张，于1891年写成《时务论》。^[10]宋育仁在《时务论》中提出了设议院、伸民权、兴学校等主张。与此同时，吴之英、梅际郇等人也产生了类似的思想。因此，《时务论》的撰写，标志着四川旧知识界的分化，出现了少数染上了新色彩的封建士大夫。^[11]这批有着新色彩的士人，已和大多数封建知识分子有所区别，在他们身上有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在不断地扩张。这种发展趋势表明他们已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或可称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封建士大夫。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争到1900年，这是四川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时期。

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是以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为其经济基础，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为其阶级基础的。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1895年，新设万元以上厂矿有17个，资本额330万元，较之前22年间每年平均只增设万元以上的厂矿3个，资本额90万元，增加了数倍（厂矿为5.7倍，资本额为3.7倍，资本510万元。与前相比，其增长率是惊人的。^[12]四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较诸沿海省分大约要晚20年，^[13]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所以四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极为缓慢。据统计,1900年前,四川主要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仅九家,见下表。

1-1 19世纪末四川新式企业一览表

业别	厂矿名	地址	资本(千元)	设立年代	备注
火 柴	森昌泰	重庆	50千元	1889	
	森 昌	重庆	50千元	1891	
	聚 昌	重庆		1894	
纺织品	棉纺厂	重庆	拟招500千两	1893	1896年停办
造 纸	铜染纸厂	铜梁	10千元	1891	
矿 冶	白果湾铝厂	会理		1894	
	麻哈金矿	冕宁	419千元	1895	
	宝兴铜矿	荣经		1896	
	四合公司	重庆	11.4千元	1899	

上表根据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二章,林顿《四川近代主要资本主义企业简表》(载《四川大学学报》84年第三期)综合整理。

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虽然缓慢,但是却标志着四川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如果说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经济动因,那么,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高涨的维新变法运动则是其催生剂。

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然而执掌大权的封建官吏是一如既往,“宁视其国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4]亡国危机的刺激和封建统治者的麻木不仁,极大地震撼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爱国

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了震惊中外、遐迩闻名的“公车上书”，参加的举人 1300 余名，“公车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蔚然勃兴。此后，维新派上书言时事，开学校，办报纸，创学会，译西书，建工厂，修铁路，兴商务，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倡言资产阶级民权。他们“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大声疾呼亡国危机，痛陈灭族惨痛：“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鸟，釜底之鱼，牢中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以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其有不胜言者。”^[15]这些救亡的呼声，变法的呐喊，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加速了进步知识分子爱国救亡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他们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四川虽然僻远，但也深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救亡图存也成为四川进步舆论界最响亮的口号，“莫不激昂愤慨，思变法以雪其耻。”^[16]他们强调：“时事孔亟在燃眉，参用西法可图速效。”^[17]维新变法运动刚兴起时，就有一批四川知识分子卷进时代的浪潮中。在“公车上书”上签名的四川举人有 71 位，他们回川后迅速把“公车上书”的影响扩散到四川各地。其后杨锐等人在北京成立了“蜀学会”、“保川会”，宋育仁等人则加入了“强学会”，宋育仁担任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保国会成立时，四川在京的知识分子有 14 人参加。^[18]如果说四川维新派知识分子在甲午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活动主要是在省外的话，那么，随着 1896 年宋育仁等人回川，他们活动的中心就移到省内，维新思潮开始在四川兴起，推动了一批旧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在 19 世纪末，报刊、翻译、出版等文化事业是使知识分子近

代化的重要手段。1897年11月，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该报以“广见闻、开风气”为宗旨。^[19]以宣传时务、鼓吹维新变法、启迪民智、救亡图存为己任。《渝报》广泛地介绍了国内外和省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形势，还翻译了部分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文章。《渝报》在政治上提出了“君民共治”的主张，要求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提出了发展民族经济，夺取市场，实行商战，“与外人争利”等主张。《渝报》以其爱国的特色而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发行的范围甚广，到次年，《渝报》在省内外22个州县建立了代派处（即零售、订阅处）；在17个省的26个州县亦设有代派处。^[20]1898年，宋育仁受聘为四川尊经书院山长到成都，《渝报》出版到第16期即停刊，改出工商小报《渝州新闻》。^[21]宋育仁到蓉后，又与维新人士邓榕、藩祖荫、吴之英、徐昱、廖平等人创办了《蜀学报》。该报从内容上看，实际上是《渝报》的继续，依然以启迪民智，“开通全省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于西学“意主推行，力求实用，言务有当，不嫌并行。”^[22]《蜀学报》发行后也颇受人欢迎，发行量达2000余份。与此同时，维新派还十分注意翻译、出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编印了“蜀学丛刊”，刊印了一些介绍英国议会章程、西方工商业法规、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文章，翻印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宋育仁自著的《法意钞案》也同时印行。^[23]经过宋育仁等人的鼓吹，维新思潮在四川兴起，“与海内时流相应和”，冲击着四川士人的思想。“自白乎老儒、黄口学僮，殆无不家喻而户诵；学使者发策决科、诸生试卷中或能用登20世纪大舞台。不自由毋宁死等语者，并得受宏奖猎高等以去，一时风气波荡如此。”^[24]

知识分子最易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封建士大夫中只要是那些关心国事，读书明理之人，在国事多艰之时，面对新思潮的兴起，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能不受到影响而产生接触西学，寻求新的救国方案的愿望。这样，在日益高涨的变法声浪中，一批旧式知识分子被时代的潮流推上维新变法之路，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蜀学会的创办起了重要作用。蜀学会是1898年春，由宋育仁等维新派人士在成都创办的，目的是联络同仁，讨论时事，培养人材，入会者既要学习经学、历代制度，也要学习“外国史学、公法律例、水陆军学、政教农商各务，”以及“语言、文学、天文、地舆、化、重、声、光、电、气、力、水、火、汽、地质、金体、动植、算、医、测量、牧畜、机器制造、营建矿学等。”^[25]蜀学会不同于旧式封建士大夫的集会结社，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学术团体。蜀学会以成都为总会，以各州县为分会，团聚了四川一批早期近代知识分子和正在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士绅，它的建立使四川进步知识界有了一个中心，讲求新学，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士开始联成一气，初步形成了一股社会力量。

新式学校的兴办，也促进了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四川各地创办新学校如雨后春笋，一时蔚然壮观。”^[26]据初步统计，1900年前，能查知名称的四川新式学堂有十余所，主要的见1—2表（本表见第9页）。

此外，外国传教士在四川也办了不少学校，1894年，美教会在重庆开办了求精中学、广益中学、启明小学，^[27]1898年，法教会在重庆办法文学堂，^[28]据《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所载，1901年以前，外国教会在四川所办的学校达460

所。^{〔29〕}

1—2

19世纪末四川学堂一览表

校名	地址	校名	地址
崇实学堂	蓬溪	西文学堂	江津
遂宁学堂	遂宁	算学堂	江津
经济学堂	遂宁	紫金精舍	广安
中西学堂	成都	川东洋务学堂	重庆
算学馆	成都	中西学堂	重庆
经济学会	彭县	广安官立学堂	广安
新亚书院	荣县	中西学堂	荣县

本表所据资料：《蜀学报》第一、二、九册；《巴县志》卷十一、下；肖湘《蒲殿俊行状》；《江津县志》等。

戊戌维新时期，四川所办的新式学校还不多，但它们的出现在四川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四川传统教育体制开始崩溃，并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场所。尽管维新派所创办的新式学校仍是中西兼学，但西学和新学的内容已明显地比洋务学堂有所增加。紫金精舍、蜀学会等在学习方法上也有所改进，采取启发式和座谈式，把培养学生关心现实的政治形势，提高分析、观察能力作为重要目标。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各地“识时之士，倡议改革学术，变更教育，五经外兼讲地理、历史、算术；自立学堂，定课程。”一变甲午战争之前“留心外邦政学、探访风气者寥若晨星”的状况。“求新者如雷之奋于地，日之升于朝欲出而